

罗曼诺夫王朝覆灭

[美] 马克·斯坦伯格 著
[俄] 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
张 蓓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曼诺夫王朝覆灭/①(美)斯坦伯格,②(俄)赫鲁斯塔廖夫著;张蓓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2.

ISBN 7-5011-4272-6

I. 罗… II. ①斯… ②赫… ③张… III. 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 IV. K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859 号

The Fall of the Romanovs

Copyright © 1995 by Yale University

Chinese copyright © 199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本属新华出版社

罗曼诺夫王朝覆灭

[美] 马克·斯坦伯格

著

[俄] 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

张 蓓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38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272-6/D·683 定价: 31.00 元(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序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实行了公开性政策，苏联的学者们可以接触到一些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材料，从而能够开展新的课题研究。在莫斯科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工作的历史档案学家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开始对1917年革命中和革命后有关罗曼诺夫王朝家庭成员的命运的文件资料进行筛选、文字整理和注释工作。他所编写的传记体评注曾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文献，本书后面的人名和机构名称表及文件注释就是在他的评注基础上整理编写的。

1993年我开始与赫鲁斯塔廖夫一起编著这本书。在多次访问莫斯科期间和通过电子邮件，我们讨论了编写的方法和途径。经与他协商，我对文件的选用作了调整，重新编写了评注，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评注；并从俄罗斯和美国的档案资料中选择了一些新的材料（包括一些罕见的照片）。我还为本书的英文版撰写了一个全面概括性的导言，以及一些解释、说明，并和翻译们在一起工作。

俄罗斯的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称是根据修改的国会图书馆译名规则译的，——主要是省略了软音，对元音做了简化处理。在人名和机构名称表中，常提到的人或机构如有不同的名字和名称，

也都标出了重读的音节。有些人，如他们的英文名字早已为人所知（例如，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则采用常用的英文名字。鉴于研究工作者们都熟悉常用的国会图书馆译名规则，所以在注明引文出处和引用俄文词语时用的都是国会图书馆译名规则。

从1918年2月1日起，俄国停止使用“旧式的”儒略历，开始使用“新式的”格里历^①，格里历在19世纪里比儒略历早12天，从1900年3月1日起比儒略历早13天。在俄国1918年1月31日这一天过后，马上就是1918年2月14日。本书中所提到的日期一般都是当时使用的日历日期。书中在涉及国际事件时则同时标出儒略历日期和格里历日期。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为了避免在时间上产生混乱，也将两种日期同时标出。在1918年1月31日以后仍错误地使用旧式日历日期的地方——尼古拉就是这样——后面都用括号标出新式的日期。

马克·D·斯坦伯格

① 指公历。——译注

导言：对尼古拉与亚历山德拉 的理智描述

俄罗斯最后一位沙皇和他的家人在 1917—1918 年期间被捕、监禁和处决的真相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很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在俄国革命后的头 10 年内，流亡者们在美国和西欧发表过几十种说法——这些说法总是充满着感情色彩，但其可信程度却各不相同，在那以后的年月里，西方作家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探索着事实的真相。在俄国，由于苏维埃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和偏见，人们不能公开讨论皇室家庭的命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实行公开性政策的初期。之后，人们对罗曼诺夫一家和他们命运的兴趣突然迸发出来，关于这方面的写作也大量涌现，随着当局决定公开原来保密的档案文件，⁽¹⁾这种热情就越发高涨起来。

皇室的遭遇之所以能激发起人们兴趣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受害者是历史上的名人和使他们覆灭的那场具有关键性的革命。一位被废黜、被监禁的专制君主，如何在一边等待着自己的机会，而互相对抗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又如何另一边决定着他和他的家人的命运，地方一级的布尔什维克们如何残暴杀害这位前沙皇和皇后、他们的 4 个女儿和患血友病的儿子以及他们最后剩下的私人随从，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戏剧性的色彩。

除了故事的本身以及官方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把这些文件列为

绝密文件之外，相互矛盾的证据，人们臆想出的有人生还和逃跑的传说，都给这些事件罩上了一种神秘的气氛。这个故事还引起了人们对道德观念的兴趣。在俄罗斯，随着共产主义秩序的崩溃，揭露过去的“真相”，成为一种能给人带来好运的行为：历史就像一出道德剧，一种分辨受害者和害人者的手段，一种扬善惩恶的方式。⁽²⁾非俄罗斯的作家也发现对俄国皇室的被害有道德意义，并有象征性。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它标志着通向“一个全新的道德领域”的大门已经打开，它是“二十世纪大屠杀的序幕”。⁽³⁾

这次所收集的文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这些事件最重要的证据，因此也为读者提供了从政治和道德角度进行判断所需要的丰富的、带有戏剧性的原始历史材料。尽管如此，选择这些文件还有别的用意。这些文件不仅揭示了历史的真相，而且还揭示了大量与事实相关的思想、社会准则、感性认识和感情。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能够提供合乎情理的评价尺度，才使得这些事件对于与之相关的人带上了个人的和历史的色彩。对于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讲，革命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幻想的时代，一个信念必然实现的时代，一个反抗束缚和屈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掺杂着恐惧，瞬间的困惑和残暴的时代。这些文件揭示了那些参与创造这段历史的人物在革命过程中的主观世界。对于沙皇尼古拉、皇后亚历山德拉，以及许多其他人来讲，革命是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本书中披露的许多文件表现了他们是如何从哲学上、道德上和情感上与这一危机搏斗的。他们在书信、日记和交谈中思考着诸如国家权力、民族特性、人性、道德观念、战争、革命、宗教、命运等问题。

在俄罗斯和西方，大多数有关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生活和命运的描写都不同程度地带着浪漫和理想化的色彩，或者带着某些流言蜚语和庸俗的成份，或多或少的为他们辩护，替他们控诉。⁽⁴⁾

本书作者所选用的文件并不是为了支持任何一种历史上的说法或评价，而是要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解释。如果读者愿意，可由自己去评价这些事件、这场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担任主要角色的人。在选择证据时作者不带任何偏见，但采用了批评的甚至是怀疑的眼光。事实真相并不象大多数作家所想象的那么一目了然。和所有历史文件一样，这些文件的内容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审视，或者故意搞错，或者故意对重要的事实避而不谈。还有一些文件已经找不到了。例如，我们不能绝对肯定莫斯科是否直接下达了杀害沙皇和他家人的命令，这个经常被断言的“事实”可能是真的，但人们却从未找到过直接的证据。⁽⁵⁾许多作家允许自己去猜测那些非常遗憾却没有文件、证据证明的事实，并且不加批评和鉴别地接受档案文件或回忆录中的说法（尤其是当这些说法与他们自己的推测和判断相同时）。因为官方将许多文件隐藏在保密的幕布之后，不能证明这些说法就是事实——这是一条不言而喻的道理，但这一点在苏维埃开放档案后所迸发出来的热情中却常常被人们忘记。秘密不等于事实。

本书中所收集的文件都是真实的历史文件，但是它们仍然仅仅是文件，这些文件的作者将我们与过去发生的一切联系起来。人们的回忆、理解、动机和意图掩盖着简单的事实。但就在这里，从这些文件作者的角度去研究这些文件，这些文件就是了解他们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在各章的引言部分，我介绍了这些文件写作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它们的含义和真实性做了分析。虽然这些文件即使从文字表面上看也常常是充分生动地叙述了在革命期间人的经历，但获益最多的读者却是那些认真研究文件内容，以批评的方式，不仅去看文件里面说了些什么而且还注意都是怎样说的，那些对文件中随便提到的话以及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都给予同样重视。

尼古拉二世在历史回忆中的主要形象是一位软弱昏庸的皇帝，他无力迎接如何率领俄国跨入现代世纪的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长期的痛苦磨难中，君主专政制度的明显失败就树立了他的这个形象，尽管这样的形容最早是在革命前由许多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俄国人提出来的。当时有个笑话曾经这样说：俄国不需要一个有限（即立宪）的君主制度，因为俄国已经有了一位（能力）有限的君主。宽容一点儿讲，很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都把尼古拉形容成一个几乎不懂得应该如何去领导和管理一个日趋复杂和不断变化着的俄国的人，而把他形容成一个更喜欢打猎，徒步旅行，打网球，游泳，骑自行车，划船，骑马，阅兵或厮守于他所热爱的家庭。

这个形象并不完全失真。尼古拉经常——在他的日记，信件和谈话中——提到他喜欢体育运动，他愿意和妻子及孩子们呆在一起，他不喜欢参加令他厌倦的正式会议和批阅大量的文件。⁽⁶⁾还有一点也很清楚，他并不是一位许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所喜欢的或为俄国所需要的那种足智多谋或胸怀远大的君主。这不是说尼古拉受教育程度不高。他的私人教师曾教授过他许多课程，其中包括外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历史、地理、数学和化学。从十七岁开始，他被介绍给主要的政治、军事和学术界人士，这些人被请来教授他管理国家所必须掌握的课程，如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国际法、民法和军事科学。这些教师给他上课，指定阅读书目，有时还要考试。所有的记载都说他是个聪明能干的学生。甚至连担任过尼古拉二世的财政部长和内阁总理的谢尔盖·维特都承认尼古拉“在智力、能力以及受教育方面都远远超过他的父亲”。但这位谢尔盖·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特别是在把尼古拉与他父亲，维特所赞美的亚历山大三世相比时——几乎没有说过尼古拉的好话。⁽⁷⁾

无论尼古拉的天赋如何，形式主义的教育方式只偏重灌输知

识而忽视培养思维能力。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几乎不重视智力的发展，更不要说想象力了，这些都阻碍了尼古拉的成长。根据当时与宫廷关系密切的人记载，他们经常听到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家庭谈论生活琐事，甚至是庸俗的话题。⁽⁸⁾在他们的生活中一般缺少对严肃艺术或知识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们从尼古拉自己写的文章和讲话以及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的回忆录中看出，他的才智普通而有限。当然尼古拉的表现就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和俄国来讲都不是唯一的。他身上的特点，反映了“十九世纪末期王室和贵族从整体上在文化和知识上都已出现的颓势”，⁽⁹⁾随着俄国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颓势就显得更加严重和危险。

人们习惯地认为，尼古拉是个可悲的软弱无能的人物。如果这样形容他还不正确的话，那么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简单、模糊的信仰与行为准则塑造了他的统治，并加速了革命的到来。造成尼古拉统治的真正悲剧的原因恐怕不是由于缺乏思想，或者是人们经常描述的所谓当时政治需要与他自己对家庭和个人爱好的迷恋之间的矛盾，而是他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与需要进行合理变革之间的冲突。尼古拉的内心由于政治权力所追逐的目标互相竞争而高度紧张又使这一冲突更加严重。同样，亚历山德拉在促成这段历史的悲剧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也不是体现在她如何把尼古拉拉向家庭生活，甚至不是体现在她干涉政府工作所起的破坏性作用上，而主要体现在她鼓励尼古拉坚持已与时代不符的政治信仰。他对世界的看法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深入，并通过自己的经历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但面对着俄国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公众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压力以及1905年迫使沙皇允许进行有限的立宪改革的一场革命动荡，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却越来越坚信俄国要生存和幸福就必须维护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行为准则和国家机制。

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观是建立在道德评价和宗教信仰之上的，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起。道德课在他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中甚至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一位近代历史学家以讽刺的口吻然而却是十分准确地评论说，从尼古拉 10 岁起就负责尼古拉教育的格里戈里·丹尼洛维奇将军“与其说他是因他的聪明才智或他的观念开阔和自由而为人所知，还不如说因他严守军纪，立正时能纹丝不动而出名”⁽¹⁰⁾。然而，关键是自我约束和高度的道德准则被认为是必须灌输到这位未来君主头脑中的最重要的品德。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尼古拉的确把这些都牢记在心中。

整齐有序是尼古拉的一个主要优点。他的日记和各种会见和活动的简单记事常被用来证明他智力平庸，但这些并不是他用来反映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手段——尼古拉在谈话、讲演和信件中经常能充分清晰地表达他的思路。日记首先是一种自我约束的锻炼。从一开始，他就用日记记录下他每天的日常活动，这些日常活动构成了他的生活内容。他成为皇帝以后也一直保持着整洁、秩序和自我约束的习惯。尼古拉出于他的个性和他信守的原则，一直坚持着一种刻板和从不改变的工作生活程序：用餐、审阅报告、会见朝臣和部长、体育锻炼、以及与家人在一起，每一项都有时间规定。⁽¹¹⁾出于同样的原因，尼古拉坚持自己的文秘事务都由自己处理——这毫无疑问地占用了很多可以用来研究政策问题的时间。但尼古拉似乎对在这种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纪律性和井然有序十分满意。据那些了解他个人习惯的人说，甚至在最琐碎的生活小事上，尼古拉也是“最整齐，最有秩序的”，他把桌子上的每一支钢笔、铅笔，浴室里的每一件物品，都不厌其烦地摆放得井井有条。⁽¹²⁾他对个人生活中正常秩序和纪律的高度重视同样应用于他对社会和政治的标准要求。

在许多方面，尼古拉的这些思想都反映了他的军队特点。在俄国以及其它国家，对于贵族出身的男子来讲，在军队中服役是传统的精修学校——一个学习军队中指挥与服从观念的地方，也

是尽情享受战友的友谊、阅兵、宴会和女人的地方。这些也都是尼古拉年青时所接受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明显，他非常喜欢他年青时的军官生活。从更深的层次上讲，他对军队的惯例、礼仪和象征的亲身了解和体验，在他心中更加增强了军队在俄国政治文化中传统的核心作用。俄国的大部分历史，特别是挣脱了鞑靼人的统治以后的历史，是一部备战和军事扩张的历史。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军事需要和军事活动在俄国的政治体制，甚至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形成中，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从象征性和装饰的角度上看，尼古拉和他的家庭成员在公开露面时，经常身着军服并参加军事活动，这也反映出军队在沙皇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尼古拉、他的妻子、四个女儿和儿子，按传统习惯都是各种最优秀军团的名誉指挥官。他们都有与军衔相配的军服，而且身着军服，带着明显的自豪和欢愉在“他们的”士兵面前露面。尼古拉用大量的时间参加军事检阅、视察、观看军事演习——他骑在马上，由他的儿子王储，逐渐长大起来的阿列克谢陪同。对这类公务活动，尼古拉从不抱怨。相反，当他描写这些活动时，总是充满了喜悦。“在温暖的夏日里，美丽的乡村景色衬托着一片白色的士兵海洋——对我来讲，除了大型舰队以外，没有什么还能比它更美妙的了。”⁽¹³⁾他不止一次地评论军装，军队仪式和军事训练的“美”，感受军事文化给予他情感和精神上的惬意。⁽¹⁴⁾1902年他在观看库尔斯克附近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时，他希望亚历山德拉能和他在一起领略那“美妙健康的感觉”和“安宁”的气氛。在爆发革命的1905年年末，在参加皇家步枪营五十周年庆祝后，他向他的母亲表示“我的灵魂已经很久没有有这样安宁了。”⁽¹⁵⁾

在尼古拉的心中，甚至有时战争都带有一股浪漫的芳香。在1904—1905年那场不幸的日俄战争中，他在信中表达了他“高

兴”地看到许多军官“为了祖国和军队的光荣”告别了自己亲爱的家人。他常常向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们发表演说，热情洋溢地赞扬他们的“英雄行为”，“光荣”和“辉煌战绩”⁽¹⁶⁾。1914年他自信地研究了战争的发展，坚持认为“正义的战争”能够激发民族感情，会使俄国空前地强大和美好。⁽¹⁷⁾在战争期间，他常写信回家，在信中不时流露出对英勇行为和对士兵和战斗之美的浪漫和热情的赞美。在1916年3月的这封信就很有代表性：“你能想象得出我是多么惊喜，在检阅大部队时，当我骑马走到军队面前，去看我们亲爱的哥萨克们，从排头的茹科夫到最后一个士兵，每个人都咧嘴笑着，露出了牙齿……我向他们转达了你的赞美和姑娘们的问候！他们刚刚从战壕中出来……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个新组建的师……他们看起来简直漂亮极了——魁梧的身材——就像近卫军一样。”⁽¹⁸⁾

尽管国家大量的收入来自国家对烈性酒的垄断销售，尽管继续战争急需金钱，但是尼古拉还是在战争期间下了禁酒令。这反映了尼古拉把战争视为一种光荣的行为。⁽¹⁹⁾在他看来，军队的传统是荣誉、责任、纪律和为民族服务。在1917年3月他退位后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中，他还是在提醒军队要牢记这些准则（39号文件）。

保持健康的体魄和进行户外活动是一种美德——这不仅是对军人的要求，也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和爱德华七世时代将健康体魄作为一种行为准则的做法的再现——这是尼古拉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家族的一个传统。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位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人，人们经常看到他去打猎、砍树、锯木头、扫除路上的积雪、破冰等活动。他很重视培养子女们具备在皇宫的院子里铲雪，从树上砍下枯树枝这样一些优点。从更广一些的意义讲，这些活动也是一种对自然和锻炼的了解。⁽²⁰⁾尼古拉接受了这个观念并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子女。有一

次，他在剧烈地步行锻炼并“全身湿透地”回来后，写信给他的母亲：“这让我想起了我亲爱的爸爸，他是多么喜欢体力活动后的大汗淋漓，我现在也喜欢这样。”⁽²¹⁾世界大战期间，当尼古拉在总参谋部指挥作战期间，他尽量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室外活动。有一次，在夜里下过一场大雪后，他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说，当他在院子里找到一把木锹，可以用来铲除小道上的积雪时，他是多么的高兴。⁽²²⁾在1917—1918年皇帝全家被关押和流放期间，体力劳动和锻炼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当他们不能从事这些活动时，这也是他们抱怨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于尼古拉来讲，室外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散心方式。而对他的个人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从尼古拉许多表达对室外体力活动的兴奋和喜悦的话中，可以察觉到它既是身体上的一种需要——其程度与他在战争期间的通信中经常表示的对妻子的热爱相同——同时也对一个人是否具备美德的一种判断。⁽²³⁾

将努力工作视为一种美德的看法与这些行为准则交织在一起。191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尼古拉王朝的半官方报道向公众介绍了尼古拉希望在公众眼中所看到的形象，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尼古拉对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这位“戴着王冠的工人”。这篇报道将尼古拉拒绝使用私人秘书描述成他刻苦的品德的表现。同样，这篇报道还说尼古拉花费大量的时间处理公务。据说，尼古拉宣称：“我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工作，让每个人都学会做至少两个人的工作吧。”⁽²⁴⁾

当全家都参加体育活动，锻炼和劳动时，这些活动就更加令人愉快而且更有意义。家庭对于尼古拉来说是最重要的。他的信充满了对妻子、孩子、母亲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和热爱，这种对家庭的亲密感情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总是喜欢引用一句俄罗斯谚语“作客固然好，但在家更好。”⁽²⁵⁾每当他离家出门——观看演习或视察军队，偶尔出国访问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指挥军队作战（这次在外面停留的时间是最长的）——他写给家里的信总是充满了对妻子和孩子们的爱，团聚后又分离的忧伤，对团聚时愉快和温暖的回忆以及对回家的渴望。

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都十分清楚地了解，有那么多贵族和王室家庭婚姻都受到了不忠诚和离婚的困扰——的确，他们经常对他们这个家族和他们这个社会阶层的放荡品行感到惊愕和厌恶⁽²⁶⁾——他们非常满意自己多年的美满婚姻。他们相互间的通信充满了亲昵的称呼，并总是用英文来写。尼古拉称呼亚历山德拉为苏妮（这是她童年时的昵称），我的甜心，亲爱的小妻子，爱情鸟，我最亲爱的小姑娘，小爱人；同样尼古拉也是亚历山德拉的尼基（这是他的小名），小丈夫，我亲爱的人儿，宝贝，天使，甜心和兰孩子（这是他们俩人都读过的一本由弗洛伦斯·巴克利所写的，他们最喜欢的爱情小说中的人物）。他们互相亲吻对方的来信，赠送鲜花，回忆互相爱抚的时刻。在这方面，亚历山德拉无拘无束：她常常回忆“那温柔的抚摸”，宣称他们的爱情是“永不死亡的”，并描述她自己用“热烈的”和“无限温柔的”亲吻，吻遍尼古拉全身。⁽²⁷⁾尼古拉的反映也是同样的，尽管尼古拉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含蓄的（他承认“我从不表露我的感情”，亚历山德拉甚至责备他，除了在写信时或在黑暗中以外，他表达爱情时很“害羞”）。⁽²⁸⁾“我是多么想念你的甜蜜的亲吻呵——是的，亲爱的，只有你才知道怎样亲吻——噢！你太调皮了！使人想起了B——y。”⁽²⁹⁾尼古拉承认退位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比在更正常的年代中，更多地与我亲爱的家人呆在一起”（56号文件[1917年5月6日]）。

尼古拉宁愿去铲雪或与妻子和孩子们守在一起也不愿去治理国家，这被人们看成是他背离沙皇这一角色的典型证据。这种逻辑过于简单了一些。无论他个人喜欢做什么，他都有一种强烈的对公众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义务感确实是尼古拉的一个主要优点，

他经常以此作为评价自己和他人的尺度。他认为自己作为沙皇所付出的劳动不仅是当时政治的需要，而且也是“义务感，或者象爸爸喜欢说的那该死的义务”的要求。⁽³⁰⁾他相信其他人也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持有同样的责任感。在1905—1906年的革命期间，尼古拉表示他坚信“如果当权者们都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社会动乱就会得到控制。他不断向工人和农民呼吁，要他们致力于“老老实实的工作”，因为那才是他们的义务。⁽³¹⁾

更重要的是，尼古拉深信他的义务就是维护俄国的独裁专制制度。在1904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级会谈中，他对内务部长彼得·斯维雅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会很乐意地放弃这一切。”⁽³²⁾尼古拉经常断言保留专制制度不是为他个人，而是为了俄国，为了上帝，为了他的祖先和他的继承人。正像他喜欢提醒士兵们那样，他们是在继承他们“祖先”所付出的“服务”，⁽³³⁾所以，他也经常说，他的义务是继续沿着他父亲曾走过的道路前进，即保留传统的专制制度。⁽³⁴⁾他相信，不能保持国家的传统，会成为国家衰败的根本原因。正如1905年6月21日（公历7月4日）他在对社会各阶层和组织代表们演讲中所宣布的，“国家只有保留它过去的遗产，它才能够强大和牢固。我们自己已经犯下了违背它的罪孽，上帝也许正在惩罚我们。”⁽³⁵⁾在尼古拉看来，1905年公众抗议的高涨不是需要进行民主改革的政治信号，而是需要恢复更极端的专制制度的神授的信号。

正是这种道德上的义务感和为民族服务感，促使尼古拉在1915年不听大臣们、他的妻子、甚至著名的宫廷神秘主义者拉斯普廷的建议，亲自统率俄国军队。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尼古拉同样也曾想到前线去指挥军队：“我的良心有时候使我感到不安，我坐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同军队一起分担战争的艰难困苦。”但

是，他所听到的建议是“这场战争不需要他亲赴前线”⁽³⁶⁾。1915年反对他亲自指挥战争或者甚至反对他在总参谋部停留过久的理由就更有说服力了：如前线的失败与他个人直接联系起来，以及将国家的日常政治控制权力交给下级，会损害他的权威。但尼古拉却认为他亲临前线会鼓舞士兵的士气。此外，与军队在一起也是他的责任。他与前几任沙皇一样，感到在国家遭受“磨难”（这个词在他的信中屡屡出现）的时刻，他应该在军队里，他应该与士兵同甘共苦。⁽³⁷⁾他在写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反复强调他这种义务感，“只在一起呆了六天就又要分离，这太难了。义务！这就是原因。”“在这个严重的时刻，分离是我们个人为我们的国家所做的牺牲，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分离就容易承受得多了。”⁽³⁸⁾可相互矛盾的是同一种对国家的义务感后来却又可能促使尼古拉同意退位。正如1917年3月2日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为了挽救俄国和保持前线军队的安定，需要我退位……”（30号文件）。⁽³⁹⁾

尼古拉对道德行为的看法是由他的宗教态度决定的。他对宗教的态度又是受他周围亲近他的人的影响形成的：有他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原为丹麦的达玛尔公主），她原本为基督教教徒，后改信东正教，她竭力给她的孩子们灌输坚定的信仰，并鼓励孩子们定期参加宗教仪式；还有宗教会议总监（教会的世俗首领）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他是尼古拉的导师之一，后来又成为他的亲密顾问。他不断地提醒尼古拉，沙皇是上帝指定的，是智慧和秩序的神授源泉；此外还有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她也是从基督教改信东正教的，她鼓励尼古拉相信神秘主义和上帝的全能和指点迷津的能力。

尼古拉在宗教活动和信仰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安慰。1900年他开始在莫斯科的古代克里姆林宫的教堂和大教堂里与全家一起正式庆祝复活节。在莫斯科第一次过复活节的前一周，他写信给他母亲：“我从未想到我能在我经历的这次大斋期内进入这样一种

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境界里……，这里的一切都适合祈祷和获得精神上的安宁。”⁽⁴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宗教沉迷愈来愈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尼古拉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深信上帝会保护俄国军队，在军队中摆放圣像，如弗拉基米尔圣母玛丽亚的圣像，能够支持和激励军队的斗志。⁽⁴¹⁾

虽然宗教礼拜仪式和肖像都是东正教的，但尼古拉的信仰却扩大到基督教和虔信派。他和亚历山德拉一起阅读过东西方各种宗教书籍。据他们的一个密友安娜·维鲁博娃讲，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相信在教堂以外，在没有正式任命的主教和神父的帮助下，是有可能与上帝和他的圣灵对话的。”⁽⁴²⁾他们还相信有那样一些圣人，上帝授予他们能医病和能预言的神秘能力。1902—1903年期间，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迎来一位法国神秘主义者菲利普·尼齐埃·瓦绍德，他曾在里昂从事受人欢迎的精神疗法，是位颇有名气的宗教迷信治疗师，一位精神向导和有超人洞察力的人。⁽⁴³⁾在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看来，他是“我们的”朋友，是获得预言和安慰的重要来源。⁽⁴⁴⁾几年以后，另一位世俗神秘主义者和宗教迷信治疗师格里戈里·拉斯普廷获得了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的信任。非神职人员担任宗教教师和治疗师，在俄国宗教传统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国教教会与这些过去一般都是农夫出身的圣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但是尼古拉似乎相信上帝是通过这些人来讲话和发挥作用的。

尼古拉并不完全听从拉斯普廷滔滔不绝的建议。他没有理会拉斯普廷1914年发出的可怕警告，尽管当时德国好像要战败，但拉斯普廷却预言战争将使俄国受到“上帝的惩罚”和“无穷无尽的巨大破坏和不幸”。⁽⁴⁵⁾他没有听从拉斯普廷反对他亲自统帅军队的劝告。他也没有采纳他大部分军事方面的建议和他推荐的一些有关政府官员任命的建议——他在写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朋友对人的看法有时很奇怪”。⁽⁴⁶⁾但是尼古拉也没有